

读黄山谷词札记

祝振玉

内容提要

在宋代词人中,前后词风迥异莫如黄庭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他的创作集中在青少年与晚年,由于时间跨度大,生活思想变迁,故致词风云泥相异。山谷之艳词是他早年寻花问柳生活的写照,然当时风气如此,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非议。对山谷艳词的批评起于朱熹,随着后来词的审美趣味趋于典雅温婉,再由于名人效应,山谷之艳词遂成集矢之的。山谷之禅理词以晚年所作《渔家傲》四首为代表其内容全取自禅宗语录,虽不入词之正格,但寄托了作者参悟有得,悔谢人生的心怀。他的艳词与禅理词恰系其人生两端,则一部山谷词不啻是作者的风月宝鉴、人生忏悔录了。

黄庭坚(山谷)以诗鸣宋,时有“苏、黄”之称,江西派诸人又奉之为宗祖,再加之黄诗又确优于他的词,故后人类以诗家目之,然就黄词本身看,说山谷能跻身于当时名家之林,恐非溢美之辞。陈后山曾谓:“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逮也。”^①方岳则说得好:“山谷非无词,而诗掩词。”^②山谷之词,虽历代第有评说,然较诸宋代其它名家,未免有门前冷落车马稀之叹。某不揣,兹将平时研读山谷词之点滴体会,敷衍成文,以求教于方家。拙文不拟作大而全的泛泛之论,但撮其要者,庶几有补专家学者之明断高论,作为次第,凡三章,一、山谷词风之异。二、山谷之小艳词,三、山谷之禅理词。

《四库全书总目》论山谷词在宋代初本与改本就已合并,这其中既有“褻浑不可各状”的俚词淫句,亦有“妙脱蹊径,迥出慧心”的佳篇雅制。词风之异反映出作者不同时期的创作实践。造成这种雅俗并存、美恶共卷的情况的原因是“当时以其名重,片纸只字,皆一概收,美恶杂陈,故至于是”,所以“宜分别观之矣”^③。

在宋代词人中,前期词风迥异则莫如山谷。前期词如《归田乐令》:“引调得、甚近日心肠不恋家。宁宁地,思量他,思量他。两情各自肯,甚忙咱。意思里、莫是赚人吵。啾奴真箇啁、共人啁”。《少年心·添字》:“心里人人,暂不见、霎时难过。天生你要憔悴我。把心头从前鬼,著手摩挲。抖擞了、百病销磨。见说那厮脾鳖热。大不成我便与折破。待来时、鬲上与那厮啾则箇。温存著、且教推磨。”可谓俚俗褻浑至甚。故清人朱彝尊编《词综》

①沈雄《古今词话》卷下引后山语

②方岳《秋崖先生小稿》卷四十三

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八词曲类

于山谷词去取特严。而后期词如《醉蓬莱》：“对朝云叆叆，暮雨霏微，乱峰相倚。巫峡高唐，锁楚宫朱翠。画戟移春，靓妆迎马，向一川都会。万里投荒，一身吊影，成何欢意。尽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极神州，万里烟水。尊酒公堂，有中朝佳士，荔枝红深，麝脐香满，醉舞裊歌袂。杜宇声声，催人到晓，不如归是”。则又清雅超拔如是。致王灼评山谷词“学东坡，韵制得七、八。”①

黄庭坚之诗风之所以如此相异，首先是因为这两类词的创作，相距时间较长。山谷的歌词创作旺盛期，集中在青少年与晚年。因为时间跨度大，其中生活屡遭变故，致使山谷词风云泥相异，而后人以其名重，无论雅郑，兼收并蓄，故今人读山谷词，风格有极不协调的感觉。

山谷词中那些风流狎昵的作品，大都作于青少年时期。山谷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不见于史乘，然从他的诗词中仍可睹其风采。山谷年青时有过宴游嬉戏，醇酒美人，快活经历。其性格气质，大概亦属于“疏隽少检”一类。他在诗中写道：“春风倚棹颺，绿发少年时。酒胆大如斗，看云飞翰墨，秀句咏蛛丝。乐如同队鱼，游泳青水湄，波涛倏相失。”……（《次韵周德夫经行不见三诗》）据他所忆，在淮南游学时期，还到过歌梁舞地的扬州。追思年少，曾约寻芳伴。一醉几缠头，过扬州，朱帘捲。（《蓦山溪》）当然少不了倚红偎翠，狎玩调笑：“梦当年少。对尊前上客邹、枚、小鬟燕、赵。共舞雪歌尘，醉里谈笑。”（《逍遥乐》）他有一首《惜余欢·茶词》正是他早年风流生活的写照：

四时美景，正年少赏心，频启东阁。芳酒载盈车，喜朋侣替合。杯觞交飞劝酬献，正酣饮，醉主人陈榻。坐来争奈，玉山未颓，兴与巫峡。歌阑旋烧绛蜡。况漏转铜壶，烟断香鸭。犹整醉中花，借纤手重插。相将扶上，金鞍腰袅，碾春焙，愿少延欢洽。未须归去，重寻艳歌，更留时霎。

从这些铺陈里，正可看到作者年少时尽欢极乐的生活情形。正由于作者早年的这种生活经历，山谷就必然地把本来就被当时人视作“艳科”“末技”的词，作为遣宾娱兴的工具，狎妓宿娼的谈助，将其玩世不恭，游戏人间的纨绔之气，大胆地寄寓于词，以致出现了“你共人女边着子，（好），争知我们里挑心。”（《两同心》）“是人惊怪，冤我忒捐就。”（《归田乐引》）等“褻浑不可名状”的俚词艳句。

山谷自宋英宗治平四年（一〇七六）二十三岁时及第后，即调汝州叶县尉，后经学官考试，任北京国子监教授，三十六岁时知吉州太和县。元祐时期（一〇八六——一〇九三）在京师秘书省充任史官修《神宗实录》，其间丁母艰一年，在此十七年中，山谷作词甚少。

宋哲宗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山谷五十岁，哲宗亲政，斥逐元祐旧党，黄庭坚被控在修《神宗实录》时有不满新法的言论，遂以修史失诬之罪被贬官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据龙榆生先生《苏门四学士词·豫章黄先生词》编年，山谷共有六十首左右的词可确定作于滴黔之后。约占整个黄词的三分之一。其中如《虞美人·宜州见梅作》、《醉蓬莱》（对朝云叆叆）《千秋岁·少游得谪》等名篇均作于此时。由此可见，山谷歌词创作的旺盛期集中在青少年（及第之前）与被滴黔以后。因为时间跨度大，造成岁月相隔，老少异趣，固是一个原因，但促成山谷词风变迁迥异的根本原因乃是他屡遭贬谪、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他在黔州的生活甚为艰苦，他这样形容：“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定风波》）山谷晚年更被贬至宜州（今属广西），境遇更为不堪。据扬万里《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记》载：“山谷之

①王灼《碧鸡漫志》

贬宜州，崇宁甲申也，馆于城之戍楼曰小南门者。明年卒焉……余闻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毗某氏馆之，太守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馆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馆之，又抵之罪。馆于戍楼，盖圉之也。卒于所馆，盖饥之寒之也”^①。在如此的境遇中，作者常常发出深深的叹息：“老来亦失少时欢”。（《鹧鸪天》）“心情那似当年日”，（《醉落魄》）他失去了产生俚词艳句的生活基础，要寻找新的思想精神的寄托，于是词也就必然地告别醇酒美人，宴游嬉戏，成为作者抒情状物，发泄胸中不平的文学样式。所谓穷而后工，正可从山谷词见之。

有人将山谷的谪黔比作，杜甫、刘禹锡的夔州之行，认为“山谷自戎徙黔，身行夔路，故词章翰墨，日益超妙。”^②黄轸《豫章黄先生传》亦称：“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犹高，笔势放纵，实天下奇作，宋兴以来，一人而已。”这里虽指的是他的诗，但也可说明他的词。政治上的打击虽使山谷生活上遭受了不幸，然在诗词创作上却翻开了新的一页，使之摆脱柳永而追踪苏轼，一扫年少时的狎昵俚俗之气，而至于清雄超拔，举首高歌。

山谷前后词风之变异，首先取决生活，然亦重其它种种因缘，特别是他的学佛好禅尤对他的词风转变有影响。据黄庭坚自称，当他早年沉溺于声色犬马，耽玩于艳歌小词之际，有一个法秀和尚曾给予当头棒喝，严厉警告：“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予以笔墨海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③。法秀为云门宗门下人，《五灯会元》卷十六有小传。山谷年少时曾谒圆通（法）秀禅师，据《五灯会元》卷十七《太史黄庭坚居士传》载，法秀知山谷好作艳词，曾呵之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当时法秀正戒李伯时（公麟）画马，山谷诮之曰：“无乃复置我于马腹中耶？”法秀答曰：“汝以艳语动天下人淫心，不止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山谷顿时“悚然悔谢，由是绝笔”。按《五灯会元》此条当本自陈善《扞虱新语》卷一：“黄鲁直初作艳歌小词，道人法秀谓其以笔墨海淫，于我法中，当堕泥犁之狱，鲁直自是不复作”。后来词家多循此说，如毛晋《汲古阁题跋》之类。

法秀和尚是否真有如此神力，通过当头棒喝，指迷起顽，使黄庭坚一下子尽改前愆，转变词风，姑且不论。但禅学对于黄庭坚思想文风的催化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他三十六岁时游舒州三祖山山谷寺石牛洞，因自号山谷道人，四十岁时过泗州僧伽塔，作《发愿文》，信誓旦旦戒酒肉女色，称：“今日对佛发大誓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淫欲饮酒食肉，设复为之，当堕地狱，为一切众生代受其苦”。还以南岳临济宗黄龙一系的法嗣自居，满怀景仰写下了《黄龙心禅师塔铭》，由于他的虔诚，《五灯会元》卷十七将之列为黄龙门下居士。黄庭坚所服膺的禅宗，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探求随缘适性，自我觉悟，实现一种蝉蜕污秽，越尘拔俗的自然人格。加之原来佛学清心寡欲，禅定持戒的说教，必使山谷感到今是而昨非，这样，他不仅失去了产生艳歌小词的生活基础，亦失去了创作淫哇之声的思想基础，他的词风也就必然发生变化。《柳塘词话》谓：“鲁直少时，使酒玩世，喜作词。……后以桂香无隐因缘有省，居官一如浮屠法。间作小词，绝不似《桃叶》、《团扇》斗妖丽者”。洵非虚语。

二

山谷之艳词，最为后人诟病。而较诸他的诗集，确判若两人，故不得不为之一辨。

山谷之艳词，无论是自报家门还是代人拟言，都是他早年寻花问柳生活的写照。这种生活追求情欲的恣肆与满足，由于取乐的对象是那些没有社会地位的青楼女子，因此，对于那

①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十二

②张侃《张氏拙轩集》卷五《跋黄鲁直蜀中诗词》

③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小山集序》

些出身于仕宦之门的纨绔子弟来说，也就不需要像通常男女青年偷情那样，悱恻缠绵，情思绵绵。他们可以“我喜欢谁就是谁”，及至让妓女们陪酒佐欢，调笑游从，并无爱情可言，因此，黄庭坚笔下的艳词，就带有浓重的纨绔气与市民气。它的特点是鄙俗与刻露。如《归田乐引》：

对景还销瘦。被个人，把人调戏，我也心儿有。忆我又唤我、见我、嗔我，天甚教人怎生受。看承幸厮勾，又是樽前眉峰皱。是人惊怪，怨我忒掴就。拼了又舍了，定是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旧。

词中写的是男女调情而不是风流相思。前人都说黄之艳词出于柳永，其实在俗艳鄙俚方面，黄比柳更差胜一筹。试比较柳永之《迷仙引》：

才过昇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算等闲，西州一笑，便千金慵觑。常只恐，容易落花偷换，光阴虚度。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柳词写了一个青楼女子从良的愿望与追求幸福的真情，虽艳而不俗，其细腻的心理描写，无疑包含着作者对这一青楼女子深深的同情。再如柳永的艳词名句“彩线慵拈伴伊坐”（《定风波》）亦不失蕴藉。而黄之艳词多写狸客妓女间的打情骂俏，争风吃醋，如《丑奴儿》：“济楚好得些。憔悴损，都是因它。那回得句闲言语，傍人尽道，你管又还鬼那人吵。得过口儿嘛。直勾得、风了自家。是即好意也毒害，你还甜杀人了，怎生申报孩儿”。又《少年心·添字》：“心里人人，暂不见，霎时难过。天生你要憔悴我。把心头从前鬼，著手摩挲。抖擞了，百病销磨。见说那厮脾蟹热。大不成我便与拆破。待来时、鬲上与厮歇则箇。温存著，且教推磨”。正因为黄之艳词的刻露与无所顾忌，所以此类作品往往缺乏比兴，全无一唱三叹的词人之旨。同样对一琵琶歌妓，晏几道的态度可以是“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临江仙》）而黄词却是“会拼千日笑尊前，他日相思空损寿。”（《木兰花令》）

正由于黄庭坚年青时佻薄玩世的纨绔之气，致使他的艳词鄙俗而流于恶趣，这是毋庸讳言的。

然而，山谷的狎妓写艳词，在当时又是不足诟病，特别是不能让他独任其咎的。北宋初年，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后，即劝导手下的功臣达官“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由此当时都市的风气是“诸幕次中，家妓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飏，酒兴融洽，雅会幽欢”^①。在这种情况下，北宋的文人士大夫远承南朝，五代风流放浪的积习，狎妓酣歌，成为一时风尚。当时的名臣如晏殊、寇准、宋祁乃至范宗淹、司马光都蓄养声伎，且都有艳词绮语传世，甚至作为一代文章伯的欧阳修，亦不乏风流艳事，据赵令畴《侯鯖录》载欧阳修居汝阴时有狎妓事并作诗纪之。柳永倚红偎翠，不爱浮名爱风流自不待言，与山谷同有词名的秦七秦少游，更是风月健将，偷香高手。《绿窗新话》卷上引《古今词话》载秦少游在扬州刘太尉家，与刘之宠姬偷情，乘狂风灭烛之际，“有仓卒之欢”，秦事后并不讳言，并眷恋不已，作《御街行》词以道其云雨之事，其率直狎昵又不在黄九之下。苏轼放浪更自绝人。“尝携妓谒大通禅师，师愠于色。东坡作长短句……令妓歌之”^②以自解。另有《贺新郎》词，自

①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

②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引《冷斋夜话》

序其本事，乃为官妓秀兰而作。所以，在当时习尚里，狎妓醉歌，也只好看作是风俗移人，贤者不免不了。再由于北宋道学初起，势力尚不十分强大，因而文人们的风流艳事，在当时不仅无损名教亦算不得无行的。所以，黄庭坚当时对法秀和尚对他的呵责，颇有些不服气：

“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海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耶^①。”他一方面承认自己年青时使酒玩世的游戏态度，另一方面又对法秀“独罪”他而不服，晏几道亦不乏侧艳之词，如“月脸冰肌香细腻，风流新称东君意”（《蝶恋花》）之类。既如此，则为何又让他独任其咎呢？

事实上，黄庭坚那些俗艳之词，在当时大家也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除了法秀和尚，也并没有招来什么非议，黄之好友晁补之当时对他的评价是“黄鲁直间为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乃着腔子唱好诗也”^②李清照对黄词的定论是：“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③都没有谈到山谷的艳词。

那么，法秀和尚为什么独罪山谷，而后人又对黄词独多訾议呢？这固然是黄学佛又违佛戒，其艳词鄙俗而流于恶趣；另一方面，名人效应又使之成为众矢之的，对他求全责备。再一方面，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又会使人们以新的价值标准衡量前人的文学成就，产生评价上的偏颇。

南宋以后，理学昌盛，儒家名教得以恢复，于是北宋文人的放浪积习，自然受到非议。黄山谷的艳词首先受到“存天理，灭人欲”的朱老夫子的批评。论其“书简皆及其婢呢，艳词小诗先已定以悦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④嗣后，一些有道学气、方巾气的文人遂群而非之，则不足怪了。另一方面，南渡以后，宋人词坛趋于典雅细密，所作以清空温婉为要，如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所论，由此北宋人的俗词艳句遂无市场，明清以降，更变本加厉，不仅自己不作，亦深非前人所为，黄庭坚之艳词更首当其冲，如李调元《雨村词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及四库馆臣之类。所以，对他们这些人的批评，则不宜随声附和。由于后来道学家与词学家的态度不是知人论世，因此他们的訾议则难免失之偏颇而欠公允。

即使抛开文人创作的环境因素，黄庭坚的艳词亦并非一无可取，从文学进化的角度看，黄庭坚的艳词“多用俳语，杂以俗谚”（李调元《雨村词话》）尽管有粗俗之谓，但他和民歌与民间语言的关系却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他的俗艳之词逗出了金元曲家的村野市民气息，倒是值得后人深究的。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论黄词“若为金、元曲家滥觞”，堪称独具慧眼。

三

毛晋《汲古阁题跋》云：“鲁直少时使酒玩世，喜造纤淫之句。法秀道人诫云：‘笔墨劝淫应堕犁舌地狱。’鲁直答曰：‘空中语耳’。晚年来亦间作小词，往往借题棒喝，拈示后人。如效宝宁勇禅师《渔家傲》几阙，岂其与《桃叶》、《团扇》斗妖艳耶？”

山谷词中有《渔家傲》四首，全是援禅入词，即所谓“借题棒喝，拈示后人”的作品，前有小序云：“江宁江口阻风，戏效宝宁勇禅师作古《渔家傲》。王环中云庐山中人颇欲得之。试思索，始记四篇”。宝宁勇禅师，当即金陵保宁仁勇禅师。临济宗南岳下十二世杨岐

①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六《小山集序》

②赵令畤《侯鯖录》卷八

③李清照《词论》、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

④《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方会禅师法嗣。俗姓竺，四明人，《五灯会元》卷十九有小传。王环中为作者友人，字里不详，山谷集中有《赠王环中》诗。考《渔家傲》词调，本为佛门法曲之一，吴曾《能改斋漫录》云：“京师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烟》等，号唐讚；而南方释子作《渔父》、《拨棹子》、《渔家傲》、《千秋岁》，唱道之辞”。京师当指汴都，此云北宋时南北僧人所用佛曲之区别。而《渔家傲》亦在其中。《词谱》卷十四云：“此调（《渔家傲》）始自晏殊。因词有‘神仙一曲渔家傲’句，取以为名”。其实非也，“神仙一曲”云云，盖指僧道法曲，则《渔家傲》本为“唱道之辞”，且始于晏殊之前，当不辩自明。而保宁勇禅师亦曾为此法曲，即所谓“古《渔家傲》”也，山谷效之，即此四首词之缘起。

词云：

万水千山来此土，本提心印传梁武。对朕者谁浑不顾。成死语，江头暗折长芦渡。
面壁九年看二祖，一花五叶亲分付。只履提归葱岭去。君知否，分明忘却来时路。

三十年来无孔窍，几回得眼还迷照，一见桃花参学了。呈法要，无弦琴上单于调，
看花特地重年少，今后水云人欲晓。非玄妙，灵云合就桃花笑。

忆昔药山生一虎，华亭船上寻人渡。散却尖山拈坐具。呈见处，系驴橛上合头语。
千尺垂丝君肯取，离钩三寸无生路。蓦口一桡亲子父。犹回顾，瞎驴丧我儿孙去。

百丈峰头开古镜，马驹踏破重苏醒。接得古灵心眼净。光炯炯，归来藏在袈裟影。
好个佛堂佛不圣，老师沈醉犹看镜。却与斩新提祖令。方猛省，无声三昧天皇饼。

这四首是山谷禅理词的代表作。其内容全取自禅宗灯录，可谓无一字无来处。依次写了菩提达磨祖师，事见《景德传灯录》卷三；灵云志勤禅师，见《景德传灯录》卷十一；德诚船子和尚，见《五灯会元》卷五；百丈怀海禅师，见《五灯会元》卷三，援禅入词本是苏门习气，但如此整篇地搬演佛典，却是山谷首创。苏轼词中有《如梦令》二首，其云“水垢何曾相受”、“自净方能净彼”云云，颇得禅门法要，然不过吉光片羽，其它如《南歌子》“师唱谁家曲”之类，亦游戏之作。可见在这方面黄比苏走得更远，说明他对禅宗典籍的谙熟，表示他的佛学功底不在苏轼之下。后人曾说苏轼是“士夫禅”而黄庭坚为“祖师禅”^①，恐非虚语。

山谷此四首禅理词虽不入词之正格，但不是泛泛之笔，更非游戏之作，它表达了作者对前辈宗师的景仰，寄寓了自己参禅有得的心怀，以及对以往人生沉浮的悔谢心理，充满禅门玄趣，不啻一篇篇归博返约的宗门公案。这组词第一篇叙述西天达磨祖师来华传法的艰辛，第二篇写了福州灵云志勤禅师因花悟道的心怀，第三篇概言德诚船子和尚度世救人的机关，第四篇揭示百丈怀海禅师弘扬宗门的公案。其中灵云禅师与船子和尚是作者平生最为心契的两个禅僧，这里面有着他自己参悟有得，摆脱世网的影子。

灵云和尚的故事，最早见于五代静、筠二僧所撰之《祖堂集》，说灵云“偶睹春时花蕊繁花，忽然发悟，喜不自胜”。至《景德传灯录》卷十一载其前三十年学佛茫昧混沌，几番出入于迷悟之间，后在汾山，见桃花而悟道，作偈云：“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叶落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这里所谓的剑，指佛家的般若慧剑，喻其能斩断世情。“

①袁宏波《庭韩杂录》卷下

“落叶抽枝”喻年复一年地苦心修习参学。《五灯会元》卷十九保宁仁勇禅师条有“摘叶寻枝即不同，如何是直截根源”句，当是山谷词中所本。禅门南宗是讲求“顿悟”的，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皆可作为顿悟的凭借，而不必去看经看教，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所以，灵云和尚睹桃花断疑情而超凡入圣实在是个很好的例子，而黄庭坚之禅学根源亦属南岳下临济宗，与灵云同属一门，^①而且他自己在学禅过程中亦有类似灵云和尚的体验，可见他作此词并非偶然。《五灯会元》卷十七载山谷早年投靠临济宗黄龙门下晦堂祖心禅师，“乞指径捷处。堂曰：‘只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论？公拟对。堂曰：‘不是，不是’公迷闷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时岩桂盛放，堂曰：‘闻。’堂曰：‘吾无隐乎尔’。公释然，即拜之”这真是不折不扣的顿悟。联系作者在三十六岁时游禅宗三祖（僧璨）山，并作诗“司命无心播物，祖师有记传衣。白云横而不渡，高鸟倦而犹飞”。（《题山谷石牛洞》）从此自号山谷道人，表示他对过去的幡然悔悟而皈依禅门，则不难推定，山谷在词中“三十年来无孔窍，致几回得跟还迷照，一见桃花参学了”云云，其意并不在开坛设教，而是借机发挥，现身说法，寄托自己摘叶寻枝虚度半生后参悟有得的心怀。他在另一首诗中也这样写道：“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不到家。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流水到天涯”。（《题王居士所藏王友画桃杏花二首》）黄庭坚如此反复地搬用灵云和尚学佛的故事，正说明在因花悟道，即物而真方面他和自己的前师是心合神交。

山谷之第三首所写德诚船子和尚，亦南岳青原行思门下人，为药山惟俨禅师法嗣、《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均有其小传。《五灯会元》卷五载：“秀州华亭船子德诚禅师节操高逸，度量不群，自印心于药山，与道吾、云岩为同交。”自谓“率性疏野，惟好山水，乐情自遣，天所能也。”后遇夹山和尚求法，师曰：“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师又问：“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山拟开口，被师一桡打入水中”船子和尚另有偈云：“千尺丝纹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山谷深契船子和尚，不惟由此首见之，在其它诗词中亦不乏其例，山谷《钓亭》诗：“影落华亭千尺月，梦通岐下六州王”。上句盖用船子和尚偈语。山谷另有《诉衷情》词一首，其小序云：“在戎州登临胜景，未尝不歌渔父家风，以谢江山。门生请问：‘先生家风如何？’为拟金华道人作此章。”其词云：

一波才动万波随，策笠一钩丝，金鳞正在深处，千尺也须垂。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水寒江静，满目青山，载月明归。

金华道人为唐代词人张志和。此首表面上说拟张志和渔父家风，而暗里全用船子和尚偈语，表明自己被贬戎州时面对江山幡然悔悟的心理。

船子和尚曾以“棹拨清波，金鳞罕遇”比喻禅门之人虽处世而不涉荣利，如行船于水而桨不及鱼身，这种不受羁勒，随缘任运的生活境界，正是山谷一生所向往的，他诗中有“洒船鱼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等泛迹湖山归隐故里的句子。如此，则山谷在诗词中常用船子和尚事，岂徒搬弄佛典，矜富夸博而已。

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集》卷二十三“涪翁参黄龙禅，有倒用如来印手段”。所谓“倒用如来印”，本指禅宗那种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当头棒喝，背后脚踢的悟道方法，这也是

（下转第73页）

^①关于黄庭坚禅学源流，参看拙作《黄庭坚禅学源流述略》《文史知识》1988年第4期。

证,其合理因素是显然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费希特不是从人们的阶级本质和社会条件看问题,而也过分强调人的性格、情趣和道德观念的作用。这就表明他并不理解人性和人的道德观念是有其阶级性和社会性的。因此,他对哲学的人性论证从本质上说乃是一种超阶级的论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从动物界脱离的这一事实表明,人具有饮食男女等自然属性。但是,人之为人,就在于人始终处于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之中,为此,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不但如此,在阶级社会中,人性、人的道德观念等又都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可见,人性或人的本质就是自然性、社会性和阶级性这三者的有机统一。而费希特仅用气质、欲望、性格、情趣等属于人性中某一层面的东西来作为人们的对某种哲学体系取舍的主要原因,显然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另外,他对哲学史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所谓人性论证,还带有固执的哲学偏见。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结语

通过上述费希特对人性的多维论述和考察。本文认为,从总体上说,费希特的这一论述是有新意

的和有价值的。他把一切有关人自身的经验放到他们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上去进行考察,这就使得人这个整个文明的最初一环,在费希特那里成为有血有肉,充满行动热情渴望的创造主体,而非纯然逻辑的空洞抽象。这是哲学史上对主体人在认识和改变世界过程中所处的地位的一次重要的探讨,这为以后的思想家们,包括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的问题的科学解决都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利用的东西。

人的问题是伴随着人类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不断出现又需要不断解决的人类共同主题之一。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探讨。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回避人的问题,恰恰相反,它则是在一个更新更科学的高度着手对人的问题作全面和深刻的评价。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学说是批判继承前人的人性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包括了费希特的人性学说。因此,探讨和研究费希特的人性学说,这对我们更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学说,以更科学地解决人的问题是有一定作用和意义的。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真正企图所在。

(上接第87页)

南岳黄龙慧南所倡导的禅门风格。黄庭坚为黄龙门下居士,不惟于禅典驾轻就熟,且能寓其心志。更在于脱落蹊径,不主故常的禅门思辨方式,常常使山谷之词,有如他的诗,恢诡谲诡,得笔外意。如他的另一首《渔家傲》,其序云:“余尝戏作诗云:‘大葫芦掣小葫芦,恼乱撩那得便沾。每到夜深人静后,小葫芦入大葫芦。’又云:‘大葫芦干枯,小葫芦行沾。一住金仙宅,一住黄公垆。有此通大道,无此令人老。不问恶与好,两葫芦俱倒。’或请以此意倚声律作词,使人歌之。为作《渔家傲》”词云:“踏破铁鞋参到老。等闲拾得衣中宝,遇酒逢花须一笑。长年少,俗人不用嗔贫道。何处青旗誇酒好,醉乡路上多芳草。提着葫芦行未到。风落帽,葫芦却缠葫芦倒”。诗中大葫芦喻人,取无是无非糊涂意。金仙宅指如来居,黄公垆为晋酒家名。“风落帽”用桓温宴集龙山孟嘉被风吹落帽事,见《晋书·孟嘉传》,山谷《鹧鸪天·重九集句》有“龙山落帽千年事”句。此首写无是无非无毁无誉的顿悟境界,笔调诙谲疏放,颇有禅门风范。虽曰酒曰花,但与早年的使酒玩世寻花问柳已不可同日而语。

山谷早年,写艳词而遭法秀呵禁,晚年效保宁作佛曲以拈示后人,其老少异趣,不啻霄壤。山谷早年富贵风流,晚节贫穷淡泊,而其艳词与禅理词,正系其人生两端,由“共舞霓歌尘,醉里谈笑”(《逍遥乐》)的风尘狎昵到“水寒江静,满目青山,载月明归”(《诉衷情》)的禅家意境,则一部山谷词,不啻是他的风月宝鉴,人生忏悔录了。

*本文引用山谷诗录自四部丛刊本《豫章黄先生集》、山谷词录自中华书局版《豫章黄先生词》龙榆生辑校